

小倉山房詩集

袁枚著
王英志校點

袁枚全集

壹



王英志 主編

袁枚全集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(蘇)新登字006號

袁枚全集

王英志 主編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

江蘇省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203 插頁64 字數4,136,000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500冊

ISBN7—80519—496—3/I·148 定價：200.00元(全八冊)

責任編輯：徐文博 朱野坪



袁枚畫像

前言

一

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字子才，小字瑞官，號簡齋，一號存齋，因居于江寧（今南京）小倉山隨園，世稱隨園先生，晚年自號倉山居士、隨園老人、倉山叟等。錢塘（今杭州）人，祖籍慈溪（今屬浙江）。袁枚于康熙五十五年（一七一六）夏曆三月二日誕生于錢塘東園大樹巷，嘉慶二年夏曆十一月十七日（一七九八年一月三日）卒于小倉山隨園。綜觀袁枚一生行狀，可分爲三個時期：

一、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四年（一七一六至一七三九）爲求學與求仕時期。袁枚五歲時開始受孀姑沈夫人家庭教育，七歲正式受業于杭州史玉瓚先生，讀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，打下古文根柢，九歲始自學古詩詞賦。雍正五年（一七二七）十二歲爲秀才，從學于學使王交河先生。雍正十二年（一七三三）十九歲改在杭州敷文書院受業于楊繩武先生，嘗呈少作《郭巨》、《高帝》二論，被批爲：「文如項羽用兵，所過無不殘滅。汝未弱冠，英勇乃爾！」（方濬師《隨園先生年譜》引）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二十一歲赴桂林廣西巡撫金鉷署中探望叔父袁鴻先生，途中所作詩爲《小倉山房詩集》之始。金鉷爲試

其才，嘗命作《銅鼓賦》，袁枚提筆立就，才氣橫溢。金氏大加贊賞，乃薦舉袁枚赴博學鴻詞試，雖報罷，但在京師獲得「奇才」之譽。乾隆三年（一七三八）二十三歲中舉。次年中進士，選庶吉士，入翰林院，是年冬返鄉完婚。

二、乾隆五年至十三年（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）爲從政時期。乾隆五年袁枚從史貽直學滿文，七年（一七四二）考試不及格，被外放江南任縣令。先後任溧陽、江浦、沐陽、江寧知縣至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，頗有成績。十二年兩江總督尹繼善曾舉薦袁枚任高郵州知州，被吏部駁回，次年袁枚即乞養辭官。其辭官原因，一是擢升無望，而不甘「爲大官作奴」（《答陶觀察問乞病書》，《文集》卷十六）；二是想專心詩文寫作，所謂「功業報國，文章亦報國」（《再答陶觀察書》，《文集》卷十六）。袁枚購得江寧織造曹頌後任隋赫德的舊「隋織造園」，改治爲「隨園」，作爲歸隱之地。

三、乾隆十四年至嘉慶二年（一七四九至一七九七）爲隱居賦閑與全力著述時期。近五十個春秋，除乾隆十七年（一七五二）三十七歲迫于經濟狀況與親友壓力，曾短期赴陝西任職外，終身絕迹仕途。二十年（一七五五）舉家入園定居。從此于隨園或與詩友聚會唱和，或埋頭創作詩文；或四處游山玩水，悠哉游哉。其晚年有幾次遠游：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）六十七歲出游浙江天台、雁蕩；次年游安徽黃山，游廣東羅浮、廣西桂林、湖南衡山；五十一年（一七八六）七十一歲遠足福建武夷山；五十七年（一七九二）七十七歲重游天台山；六十年（一七九五）八十高齡仍徜徉於東南山水之間。行萬里路，得江山之助，寫下了大量山水詩文。嘉慶二年八十二歲病痢卒于隨園。

袁枚生活的時代爲康熙後期與雍正、乾隆時期的所謂「康乾盛世」。當時資本主義因素的活躍與市民階層的擴大，推動了進步思潮的發展，明末以李贄爲代表的反理學的傳統在清代顏元、李璘、戴震等思想家的身上發揚光大。袁枚亦反理學，并且旗幟鮮明地傾向顏、李。清代盛行漢學考據之風，雖然有其整理古代文獻的功績，但又確實是清貴族借以實行思想統治的手段。袁枚對考據在理論上採取了批判的態度。袁枚於《遣興》詩自道其思想爲「鄭、孔門前不掉頭，程、朱席上懶勾留」。袁枚的人生觀原本入世，從政政績不錯，但又不甘於「爲大官作奴」，終於脫離官場，滿足於「安居以適性，覃思以卒業」，《答朱竹君學士書》，《文集》卷十九的閑適生活了。他曾自白道：「至人非吾德，豪傑非吾才。見佛吾無佞，談仙吾輒非。謂隱吾已仕，謂顯吾又乖。解好長卿色，亦營陶朱財。……先生高自賞，古之達人哉！」《秋夜雜詩》，《詩集》卷十）這表明袁枚具有通脫放達的人生觀，獨立不羈的個性，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。當然，其中亦包含士大夫的消極因素。這一切都直接影響到袁枚的文學思想與文學創作。

袁枚首先是位詩人與詩論家。舒位《乾嘉詩壇點將錄》奉之爲「及時雨」宋江，可見其總領詩壇的地位。袁枚與趙翼、蔣士銓并稱爲乾隆三大家，而以袁枚爲首。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及其他詩文中論詩倡言性靈說，它順應了時代進步的美學思潮，道出了詩歌創作的本質與規律。性靈說的理論核心是從詩歌創作的主觀條件的角度出發，強調創作主體必須具有真情、個性、詩才三方面要素。在這

三塊理論基石上又生發出：創作構思需要靈感，藝術表現應具獨創性并自然天成；作品內容以抒發真情實感、表現個性為主，感情等所寄寓的藝術形象要靈活新鮮、生動有趣；詩歌作品宜以感發人心、使人產生美感爲其主要藝術功能等詩學主張。鑒于此，則須反對束縛性靈的「詩教」觀及規唐模宋的擬古格調說，亦反對以學問代替性靈、堆砌典故的考據爲詩之風氣；但詩歌創作又不排除輔以學問與人功。由此可見，性靈說實際是一套比較完整的詩論體系，內涵是相當豐富的（詳參拙著《清人詩論研究·袁枚性靈說內涵新探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）。性靈說于康乾詩壇王士禛神韻說、沈德潛格調說、翁方綱肌理說之外，獨樹一幟，集結起以袁枚爲主將、趙翼爲副將，張問陶、舒位、孫原湘、王曇等爲輔翼，以及衆門生弟子爲基礎的性靈詩派，開創出乾嘉詩壇的新格局。

袁枚《小倉山房詩集》存古今體詩四千四百餘首。這些詩大多符合其性靈說主張，可稱爲性靈詩。但由于詩人所抒寫的感情性質不同或所描寫的審美對象有差異，每一首詩的特色也就有所側重。一般來說，其寫社會人生、抒發主觀性靈的詩真性情的因素更明顯；寫自然景物的詩形象靈活新鮮、情趣盎然等特點尤突出。有些作品用典過多，不屬性靈詩，但亦不乏佳什。袁枚詩作內容較爲豐富，佔比重較大的是真性情詩與山水景物詩，值得一提的還有諷諭詩。

袁枚自稱「天性多情句自工」（《讀白太傅集三首》、《詩集》卷三十），其性靈詩所抒發的真性情是多方面的。其中最動人心弦、入人心脾者當爲抒寫悲歡離合之作與比較健康的情詩和直抒胸臆、表達個性的篇什。悲歡離合之作首推悼亡詩（廣義）。袁枚極重骨肉之情、夫妻之愛、手足之誼，一旦有親人永訣之悲，則宣泄于筆端。如《隴上作》悼祖母，《哭三妹五十韻》悼三妹，《哭阿良》悼愛女，

《哭聰娘》悼愛妾，皆字字是血，字字是淚，真是「語語從肺腑流出，詩家講性靈者無以過之」（吳應和等《浙西六家詩鈔》李西臺評袁詩語）。袁枚還有不少寫鄉情與天倫之樂的性靈詩。《月是故鄉明》，人是骨肉親，袁枚每當返回或離開故鄉杭州，其種種感慨都注入詩篇，如《歸家即事》、《還杭州》、《過葵巷舊宅》、《還武林出城作》等，皆膾炙人口。其場面歷歷如畫，其人物神情畢肖，其別情真摯無飾。語言口語化，親切自然。袁枚的情詩頗值得注意。他認為：「有必不可解之情，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。情所最先，莫如男女。」（《答戴園論詩書》、《文集》卷三十）其情詩具有「發名教之偽藥」（馮夢龍《山歌序》）的意義，令道學先生扼腕切齒。盡管有「放浪褻狎，自命風流」（《浙西六家詩鈔》評語）之弊，但亦確有比較健康的緣情之作，如《古意》、《寄聰娘》、《病中贈內》、《楓橋有懷》等寫男女情思，生動細致，纏綿真摯，或一唱三嘆，或九曲回腸，具有一定藝術感染力。此外，袁枚直抒懷抱的性靈詩則突出地體現了他不拘禮法，惟我所適的個性。如《子才子歌示莊念農》、《自嘲》、《遣興》等，或口氣狂妄，無所忌諱，或談諧洒脫，風趣曠達，塑造出思想解放、獨立不羈的自我形象。

袁枚性靈詩還注重「江山之助」，表現詩人對山水景物獨有的審美感受，并以空靈活脫、富于生氣的形象，樸素自然的白描手法，新鮮風趣的語言，再現出自然美的千姿百態，傳達出別致脫俗的審美情趣。古體山水詩神思飛越，筆墨放縱，「落想不凡，新奇眩目」（《浙西六家詩鈔》評語）。寫山者如《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諸山》、《登華山》、《登最高峰》等，寫水者如《觀大龍湫作歌》等，都傳神地描摹出名山巨瀑各自的特徵，刻劃出詩人各異的感受，其飛動的筆勢，大膽的想象，使山水亦具有了靈性。近體山水詩無論是寫南方山水的《興安》、《江中看月》，還是寫北國風光的《沙溝》、《山

泥》，都體現出「隨園詩處處虛靈活潑」（《浙西六家詩鈔》評語）的妙處，形象精警而靈活。其景物詩富于靈性的佳句極多，如「幾條金線忽搖曳，楊柳比人先覺風」（《春日雜詩》）、「輕風剛值吟殘春，替我吹翻一頁書」（《步山下偶作》）、「梧桐知秋來，葉葉自相語」（《夜立階下》）、「青苔問紅葉，何物是夕陽」（《苔》）一類詩句，都別致地寫出自然景物的靈性，頗得楊萬里之真髓。

袁枚性靈說詩論并不強調詩反映社會人生，只倡言寫個人的性情遭際。但在創作實踐上却有不少作品面對歷史人物而借古喻今，或直接揭露社會弊端，可以納入諷諭詩範疇。這就以實踐補救了理論上的不足。袁枚通過對當代人物真實經歷的描述，以揭露統治者賞罰不明、用人不公等政治弊病，顯示出過人的膽識。如《隴西將軍歌》、《老將行》中的老將當年為國立功疆場，「背上箭瘢三百處」，後來竟「流落江湖場」，而無半點戰功者却「列爵紛紛半鼎食」，真乃是非顛倒，其中亦寓有詩人對當政者賞罰不公的憤懣。袁枚在任縣令期間，十分關心民生疾苦，曾云：「蒼生我輩憂」。《寄梅岑》、《詩集》卷二十）當水、旱、蝗災給百姓帶來巨大痛苦之時，寫下《苦灾行》、《南漕嘆》、《捕蝗謠》等詩。詩可貴之處在于不僅記敘了灾情，更着力把鋒芒指向人禍。如《捕蝗謠》抨擊「苛政猛於虎」，蠹吏虐于蝗的社會黑暗，《南漕嘆》、《徵漕嘆》直接勾勒貪官污吏的醜惡嘴臉，這類詩在內容上與白居易的諷諭詩精神一脉相承。風格亦近于新樂府，其詞直而徑，其言直而切，通俗易懂。袁枚有頗多咏史詩，如其所主張的「借古人往事，抒自己之懷抱」（《隨園詩話》卷十四），即對現實社會人生發表見解，間接反映現實社會。如《馬嵬》貶抑君王，同情黎民百姓的命運，《施將軍廟》、《謁岳王墓作十五絕句》稱贊小校「雄心似出將軍上」，亦是對現實官僚的間接否定。而《黃金臺》嘲諷燕昭王「不報仇時

不築臺」，更是對統治者招賢納士之目的的誅心之論，亦呼喊出懷才不遇者的憤慨之聲。袁枚的咏物詩亦不乏針砭時弊、揭露世俗醜態的諷諭之什。其咏物多含有深刻的寄托。如《悼松》是控訴社會對人才的摧殘，《雞》是對主奴關係的揭露，《紙鸞》鞭撻官場上不學無術之徒，《買梅》為社會勢利小人寫照，均是借物喻人，針對社會弊端與世態人情而發。

綜觀上述，袁枚詩歌在內容與藝術上都有相當成就，故不僅在當時有很大號召力以形成性靈詩派，而且對近代詩人亦有影響。但袁枚詩遭到後人非議，亦不為無因。其詩寓意深刻之作畢竟不多，而游戲筆墨或格調低卑之作亦不少，時有油滑纖佻之習；藝術上有一些詩採用生僻典故，失去白描本色，意象常重複，不合創新之旨。這表明袁枚創作與理論之間尚有距離。

袁枚亦是位古文家、駢文家，成績斐然，以致程晉芳有袁枚「古文第一，駢體第二，詩第三」（《上存齋前輩》，《續同人集》）之評。其文有議論、銘錄、志傳、碑記、書序、題跋、尺牘等等，幾無體不備。袁枚于詩主性靈，反復古；于文則崇尚韓、柳古文理論，推重秦漢文之古法，所謂「欲奏雅者先絕俗，欲復古者先拒今」（《與孫備之秀才書》，《文集》卷三十一），并自稱「于文極秦漢」（《送嵇拙修》，《詩集》卷二十）。當然，袁枚文復古并不擬古，于古法能靈活掌握。

袁枚自稱「文章幼饒奇氣，喜于議論」（《答程魚門》，《文集》卷十八）。其論議之文立意精警脫俗，敢於衝決傳統觀念，顯示出不凡的膽識。早在十四歲時寫的《郭巨論》就抨擊封建禮教，初露鋒芒；其他許多古代人物論或翻案，或出新，都自出機杼，立一家之言。袁枚鄙薄宋學、漢學，故于《宋儒論》中明確贊同顏、李對程朱的批判，在《清說》中論證「情欲」的合理性，《書〈復性書〉後》又從性與

情關係角度批評「尊性而黜情」，肯定情非惡，「可以爲善」，《策秀才文五道》則攻破「道統」之說，以動搖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；在《答定宇第二書》又質疑「六經」，以動搖考據學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，《答惠定宇書》揭露「漢學偏于形而下者，故箋注之說多附會」之弊。文章都寫得氣勢逼人，具有雄辯的邏輯力量。袁枚的志傳碑記文爲各種人物立傳，勾勒出清中葉的人物群像，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風貌。其中既有衆多的達官貴人，亦不乏布衣寒士，乃至「厨者」、「短人」。袁枚寫人能抓住人物身份、個性、細節，特別是善于選擇典型事例，事中見人。袁枚于《答姚小坡尚書》主張記事須「提挈剪裁」，「瑣碎事端，概從刪節」，其文記事寫人正是遵循這一主張的。其游記寫山川景物，注重寫出各地山川特點，傳達出山川精神，常賦予自然景物以靈性，並表達出作者的性靈個性，與其山水景物詩異曲同工。其祭誄文可稱抒情美文，筆鋒浸潤着真情實感，如《祭妹文》這類佳作恰如《古文觀止》評韓愈《祭十二郎文》所云：「情之至者，自然流爲至文。讀此等文，須想其一面哭一面寫，字字是血，字字是淚。」又與其真性情的悼亡詩血脉貫通。如果說其古文學韓、柳，則駢文追徐、庾，而又能自抒胸臆，寫得古峭綿麗，典雅豐博，聲韻鏗鏘，敲金戛玉，餘味不盡。其尺牘短小精悍，論政談古，評文品詩，抒情記事，題材廣泛，信手任心；文詞雅麗簡潔，寸鐵殺人；可與蘇、黃小品媲美。袁枚的《隨園食單》，不僅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筆財富，足够今天烹飪家們借鑒，而且文字活潑風趣，巧譬疊出，妙喻解頤，時時流露出袁枚特有的情性。

袁枚又是一位筆記小說家。其《子不語》爲清代文言小說名著之一，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一席之地。袁枚自稱「文史外無以自娛，乃廣采游心駭耳之事，妄言妄聽，記而存之，非有所惑也」，《子不

語・序》，似乎是游戲筆墨。其實並不盡然。此書不僅寫道聽途說或虛構編造的鬼神妖怪，亦記親身經歷或有根有據的真人真事；既有游戲之筆，亦多諷世之文。許多篇章具有強烈的思想性，符合時代的進步思潮，顯示出袁枚反叛傳統的精神。如不但貶斥「煩證轉引」、「以瑣屑爲功」（《麒麟賦》）的漢學考據之士，更抨擊「以他人皮肉，博自己聲名」、「口談理學，而身作巧宦」（《全姑》、《狐道學》）的理學家，而且嘲諷「作爛八股時文，看高頭講章」（《地藏王按案》）的平庸儒生。正面肯定的則是與「存天理，去人欲」教條相悖的人性（《沙彌思老虎》），贊賞的是爲婚姻自由而抗爭的青年男女（《全姑》、《鳳凰》）。作者愛憎分明的思想傾向性，確不可一概視爲游戲譏言。袁枚說：「我纂鬼怪書，號稱《子不語》。」（《題羅兩峰《鬼趣圖》》、《詩集》卷二十七）其中大半篇幅記鬼怪神佛之事。但袁枚明言「非有所惑也」，他并非相信鬼神而宣揚之，從這點上來看，倒確是「妄言妄聽」，故稱「隨園戲編」。其實袁枚并不相信鬼神，故亦不懼鬼神。書中的《陳鵬年退鬼》、《治鬼三妙》、《鬼畏人拚命》等都是寫罵鬼、趕鬼、打鬼之事；而《觀音作別》、《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》等則對神佛表示了大不敬，極盡挖苦之能事，更有《土地受餓》等借寫鬼神反映社會黑暗，揭露貪官污吏橫行不法的行徑；《鬼借官銜嫁女》、《鬼寶塔》等又反映了世風日下、世態炎涼的社會現狀。這都與其諷諭詩精神相通。當然，作爲封建士大夫之作，又自稱「戲編」，《子不語》亦有一些庸俗無聊的東西，有的甚至猥褻低級，如魯迅所謂的「亦多蕪穢」，是應該揚棄的。從藝術上看，《子不語》繼承六朝志怪筆法，魯迅評爲「其文屏去雕飾，反近自然」（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），一般都寫得簡潔自然，以白描手法取勝；一些長篇則描寫得情節跌宕，曲折有致，得唐人傳奇之妙。少數篇章有蕪雜之弊，乃書中敗筆。

綜上簡述，袁枚思想解放，多才多能，文學成就斐然可觀，是清代不可多得的進步的全面的文學家，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。

三

袁枚一生著作頗多，版本亦繁。但袁枚到底寫了多少著作，編選、校定出版了多少他人著作，至今未見有人說正確或說全面。《清史稿》袁枚本傳稱袁枚「著《隨園集》，凡三十餘種。上自公卿，下至市井負販，皆知其名。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」。《中國叢書綜錄》署《隨園三十種》為袁枚著。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上海校經山房成記書局出版《袁枚全集》，收書四十餘種。今人亦多稱袁枚著作「共三十餘種」（如顧學頤先生《隨園詩話校點後記》等）。這是一個大誤會，實際上其中有一、二十種著作與袁枚無涉。袁枚生前曾印行《隨園集》，又名《隨園全集》，六十卷或六十四卷，係詩文集。《隨園詩話補遺》卷三云：「余刻《詩話》、《尺牘》二種被人翻版，一時風行，賣者得價故也。近聞又有翻刻《隨園全集》者。」可知《隨園全集》并不包括詩文以外的著作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「全集」，更談不上「三十餘種」。後人所說《隨園全集》即隨園刻本《隨園三十種》，却并非都與袁枚相關。

可以確定為袁枚本人的著作現存十種：

（一）、《小倉山房詩集》三十九卷（正三十七卷，補二卷）。袁枚在乾隆十年至十二年（一七四五至一七四七）任江寧知縣期間，其「門下士談敏奇為刻《雙柳軒詩文集》二冊」，其中一冊當為《雙柳軒詩》（《沐陽品蟬亭觀察招游舊治，十月五日渡河宿錢翁家，次日寓萊園作》自注：「少時梓《雙柳軒

詩》。見《詩集》卷三十三。這是袁枚詩與文首次編集付梓。但「罷官後，悔其少作，將板焚毀。後《小倉山房集》中僅存十分之三」（上引未注者均見《隨園詩話補遺》卷四）。乾隆二十年（一七五五）袁枚曾自編詩集十卷，作于是年的《編得》詩云：「編得新詩十卷成」，「卷中一字一編摩」（《詩集》卷十一）。此集是否付梓不詳。乾隆三十二年（一七六七）又編過詩集，并由蔣士銓校定，故是年有《謝荅生校定拙集》詩（《詩集》卷二十）。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編成詩文集《隨園全集》，作于是年的《全集》編成，自題四絕句云：「不負人間過一回，編成六十卷書開」（《詩集》卷二十四），詩文各三十卷。後增至「小倉山房六十四卷《全集》」（《隨園詩話補遺》卷三），並將「少作，盡行刪去」（《行役雜咏》，《詩集補遺》卷二），此為乾隆五十五年（一七九二）袁枚「又補編一次詩文集，都增加到三十一卷」（《小倉山房詩文集》前言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。此後，又增至三十七卷，當在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以前。嘉慶元年六月袁枚有詩《嘉慶元年六月，偶觀杭堇浦先生《詞科掌故》，載余詩文甚多，頗有可存者，因命阿通錄出，分入《補遺》」（《詩集補遺》卷二）。此年《小倉山房詩集》基本定型，上詩中所謂《補遺》指卷一，自注為「癸丑至丙午刪餘改剩之作」，時已編就。《補遺》卷二即從《詞科掌故》中錄出補入者。《小倉山房詩集》乾隆隨園刻本僅三十二卷，嘉慶初隨園刻本始收全正，補三十九卷。

（二）、《小倉山房文集》三十五卷（正二十四卷，續十一卷）。其編集進展情況與《小倉山房詩集》相似。初編為《雙柳軒詩文集》之《文集》。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編《隨園全集》六十卷，《文集》三十卷，李英《小倉山房外集》序即稱「隨園先生古文三十卷」；乾隆五十五年（一七九〇）增至三十二

卷。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續補至三十五卷，作于是年的詩《消暑無事，偶檢破簾得未刻古文九十餘篇。中有可存者理而出之竟留其半，大概皆少作也。然非老耆之不能割愛，即當時之過于矜嚴，始付開雕，以質觀者》（《詩集》卷三十六）可證。《小倉山房文集》乾隆隨園刻本爲三十二卷，嘉慶初隨園刻本始收全三十五卷。

（三）、《小倉山房外集》八卷（正六卷，補二卷）。駢體文集。初編六卷。李英序云：「以駢體六卷爲《外集》，命英序之」，時爲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。後增至七卷，爲乾隆隨園刻本，係第一次補增。嘉慶隨園刻本已收八卷。

（四）、《袁太史稿》一卷。時文集。盡管袁枚自稱「余不喜時文」（《詩話》卷十二），但爲應付科舉考試不得不試筆，并編成此集。袁枚在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）中進士，此集當成于此年。刊行甚早，流傳亦廣。《隨園詩話》卷十二記作者于是年出游處州仙都峰，遇虞氏兄弟，即稱：「吾輩讀《太史稿》，以爲國初人。」可以爲證。今有乾隆、嘉慶隨園刻本。

（五）、《小倉山房尺牘》十卷。書信集。初刻本爲六卷，《隨園詩話》卷十四記：揚州洪錫豫「爲余梓《尺牘》六卷」。又，作于乾隆五十六年（一七九一）的《贈揚州洪建侯秀才》詩自注云：「蒙刻《隨園尺牘》」（《詩集》卷三十二），則六卷本《尺牘》最晚在是年已付梓。晚年增補至十卷。此外有同治二年文光堂刻本，一九二三年世界書局胡光斗箋注本等，皆爲八卷本，屬于選本。但其中有四篇爲十卷本所無。

（六）、《廣外餘言》一卷。短論集，是對《小倉山房尺牘》未盡之意的彌補。袁枚其他著作中未見

提及，但有隨園乾隆、嘉慶刻本，故可信。

(七)、《子不語》三十四卷（正二十四卷，續十卷），又名《新齊諧》。筆記小說集。約寫于乾隆三十年（一七六五）的《尺牘》卷二《與裘叔度少宰》云：「有《子不語》一種，專記新鬼，將來錄一副墨，寄呈閣下，依然《燈下叢談》，定當欣暢。」可見此年正集已編成，但未付梓。今存最早版本為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）隨園刻本。袁枚寫于乾隆四十五年（一七八〇）的《余續夷堅志》未成，到杭州得逸事百餘條，賦詩志喜（《詩集》卷二十六），表明此年《續子不語》已在編著中；寫于乾隆五十四年（一七八八）的《尺牘》答趙味辛》又說：「拙刻《新齊諧》妄言妄聽，一時游戲，故不錄作者姓名，無暇校勘，謾言誤字，不一而足，乞示知以便改正。寄來三條，容當續上。」（《尺牘》八卷本）這表明《續子不語》此年尚未編定，最早刻本為嘉慶初隨園刻本。

(八)、《隨園詩話》二十六卷（正十六卷，補十卷）。正編最早刻本是乾隆五十五年（一七九〇）隨園刻本，得到畢秋帆等資助。《尺牘》卷六《與畢制府》云：「枚撰《隨園詩話》十六卷，」蒙尚書許爲開雕，不覺欣幸」。《詩話補遺》卷十記有丁巳即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）嚴小秋事，故《隨園詩話補遺》定稿成集不會早于嘉慶二年；有嘉慶隨園刻本。

(九)、《隨園隨筆》二十八卷。考據文字集。袁枚自稱「考據之學，枚心終不以爲然」（《寄奇方伯》，《尺牘》卷七），「然入山三十年，無一日去書不觀。性又健忘，不得不隨時摘錄。或識大于經史，或識小于稗官，或貪述異聞，或微抒己見，疑信兼傳，回冗不計。歲月既久，卷頁遂多，皆有資于博覽，付之焚如未免可惜。乃題《隨園隨筆》四字，以存其編」。除了成集二十八卷，「此外零星散記未分